

陈红旗 著

中国左翼文学
的演进与嬗变
(1927-193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红旗 著

中国左翼文学
的演进与嬗变
(1927-193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左翼文学的演进与嬗变: 1927~1937 / 陈红旗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161-7336-7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左翼文化运动—研究—1927~
1937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076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关 桐 陈肖静
责任校对 王 楠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625
插 页 2
字 数 225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言 左翼文学的发难动机与性质界定

1927—1937 年间是中国左翼文学大放异彩的一个历史时期，甚至有后人一度将左翼文学定性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学，这显然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左翼文学思潮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国民政府、主流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打压的境地，它并没有与“主流”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结合在一起，这就决定了左翼文学不可能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的文学”^①，也决定了左翼文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生态圈中始终处于一种边缘性的存在情状，并充满了生存危机感。1936 年“左联”解散之后，左翼文学思潮在 1937 年毫无阻碍地也是极为自觉地汇入抗战文学大潮之中，这意味着在一段时期内作为一种主要意旨是为了与国民党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和主流话语进行对抗的相对“独立”、“自足”的左翼文学思潮开始消隐。从历时的角度来看，20 世纪 30 年代左翼文学思潮历经了 10 年时间，在两代文学作者身上得以完成，第一代作者以“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鲁迅、茅盾、郭沫若、蒋光慈等为代表，第二代作者以“左联”成立前后成长起来的丁玲、柔石、胡也频、洪灵菲、萧红等为代表。后者对前者具有一定的承继性，但并非简单的师承关系，而是一种比较平等的“同路人”关系。这两代作者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活动纠缠

^① 王富仁：《关于左翼文学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 年第 1 期。

在一起，他们共同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创作主体。

以“左联”的成立作为标志来进行分期，左翼文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27年至1930年“左联”成立之前是左翼文学的初期发展阶段，1930年“左联”成立以后至1937年抗战文学兴起是左翼文学的成熟发展阶段。从1927年开始，左翼文艺界有了明确的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难的强烈诉求。这里的“发难”主要取“发动反抗”之意，《史记·太史公自序》：“天下之端，自涉（陈涉）发难。”另外，“发难”也有“质难”之意，王季友《酬李十六岐》诗：“千宾揖对若流水，五经发难如叩钟。”^①而左翼文学发难的初始动机是通过激进的话语形式书写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等情状，来表达自身的批判意识、抗争立场以及争取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的诉求。及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被进步文艺界广泛认可之后，左翼文学得以不断演进。“演进”即“演变发展”。因此，“左翼文学的演进”主要是指左翼文学的演变发展和走向成熟之意，而其演进历程大致呈现为“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的情状或曰过程。或者说，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左翼文学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实现了从“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的嬗变。

相比于创作主体和历史分期，文学性质的界定要更为重要一些。实际上，“左翼”不但是个可以表明政治立场的概念，而且本身就是个能够说明文学性质的概念。左翼文学运动首先发生在国外。“最早以‘左翼’命名的文学组织是1922年在莫斯科出现的文学团体，无产阶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是这个团体‘左翼艺术阵线’的组织者和领导人，这也许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政治上左翼

^①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22—1123页。

激进派的概念来标榜自己革命的政治色彩的组织。”^① 在内部阶级矛盾和外部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化的过程中，在政治革命无法完全反映中国社会问题时，在外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尤其是文艺思想的影响和催化下，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以太阳社、后期创造社和我们社成员为主体的具有“左翼”立场的作家与理论家开始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由于上述社团成员或者留学过苏联，或者留学过日本，所以这就决定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难者主要是由留苏和留日的知识分子所构成的。中国左翼文学在发难过程中，对其外来影响最大的是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潮，其次是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潮。“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典范，并很自然地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让一直在中国社会中找不到新出路的“左”派知识分子明确了可资借鉴的革命范本，并希图学习和利用“无产阶级革命”这种手段来彻底改造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同理，“明治维新”使得日本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所以留日知识分子希图借用日本近代化的成功经验来为中国社会改造提供一条道路。对应于这种变革社会的革命思潮和文学自身的发展趋势，中国新文学发生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嬗变。在内容方面表现为：在反帝反封建、反专制反强权的同时，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在哲学观和历史观上，信奉“人民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和动力，力图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改造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要求思想变革和阶级解放。形式方面，表现为形成了新的表现手法、叙事模式和“大众话语”。这个变革的过程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历史是保持一致的，它反映出了“五四”以来进步思想文艺界的共同诉求和价值取向。这意味着在俄苏和

^① 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0 页。

日本发生的同样性质的文学变革也在中国得以发生，尽管国民党的统治延缓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进程，却加快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变革进程，并使得中国新文学的变革独具特色。寻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到“普罗文学”的变革轨迹，也为左翼文学的性质界定和历史分期找到了多重依据。

一般来说，学界将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到1937年抗战爆发这段时期称之为“左翼十年”。可笔者认为，1927年才是中国左翼文学发难的起点。如是说并不等于意图用政治事件来定性文学问题，但思考中国左翼文学问题是不能回避政治因素的影响和作用的。从政治层面上看，1927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代，因为这一年发生了很多重大的政治事件：从国内情况来看，国民政府外交部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上海工人发动第二次和第三次武装起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处决，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共产党先后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建立了全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从国际情况来看，日本已经制定了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富侵略性的对华外交政策。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政治局势变化实在太剧烈了。但话又说回来，从文学层面来看，1927年同样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代，因为是时的新文学出现了巨变前的种种前兆：在革命文学家蒋光慈的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渴望无产阶级革命、急欲突破“五四”文学传统的强烈诉求；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李铁声等人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文艺问题；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鲁迅、茅盾等人的创作也都显现出了一些质的变化。这些激进性的变化不仅展现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发展轨迹，更表现了“革命文学”向“无产阶级文学”演进和嬗变的不可逆性。

当然,“左翼”的文学因素在1927年之前就已经开始萌生。我们可以追溯到1923年,那是“五四”文学革命由盛转衰、各种思想冲突日益激化的年代,郭沫若在文坛中提出了对新文学的“浑朴”希望——“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①。1924年沈泽民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刊文,大力提倡作者写作能够反映社会、民众意识、无产阶级情绪的“革命的文学”和不空谈革命的“真真的革命文学”^②。此后,又有人提出了“第四阶级文学”、“国民文学”、“农民文学”、“工人文学”、“工农文学”、“劳动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等说法,尽管这些提法并未流行开来,但最后通通凝聚、精化成为“革命文学”这个概念。这些提法的出现意味着“五四”以后最具叛逆性的“革命”思想家和文学家正在涌现,也意味着“五四”文学变革的新因素早就在酝酿着、准备着和蕴育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1923年以来的“革命文学”是左翼文学得以发生的本源,但当时“革命文学”的政治性质和文学性质并未得到明确界定,这是因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共双方在反帝反封建意义上都代表了先进的革命力量,也都在提倡“革命”和“革命文学”,甚至到1927年国民党仍在提倡“革命文学”,如在广州出现了所谓“革命文学社”,出版了《这样做》旬刊,第2期刊登的《革命文学社章程》中就有“本社集合纯粹中国国民党党员,提倡革命文学……从事本党的革命运动”等语^③。所以我们不能把提倡革命文学的功绩笼统地归结在共产

① 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创造周报》,1923年5月27日,第三号。

② 泽民:《文学与革命的文学》,载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03—407页。

③ 鲁迅:《革命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5页。

党人和左翼文人的身上。至于国民党人提倡的“革命”和“革命文学”被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和文学范畴，那是在国共分裂以后才被左翼文艺界逐渐确证和强化的事情。

1927年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当权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工农群众和共产党人，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局势下，为了彰显与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歧异性，更是为了凸显反抗国民党当权派屠杀和压迫的政治倾向与思想立场，以郭沫若、蒋光慈为首的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作家开始将新文学创作与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题材广泛结合在一起，并将这种“革命文学”改名为“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此后，左翼文艺界对“普罗文学”进行了多重定义和本质界定，才使得其内涵和外延逐渐固定下来，也使得“普罗文学”成为一种与以往革命文学并不相同的新的文学形态。“普罗文学”作为中国左翼文学的一种具象形态，它是“红色的三十年代”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中国的反映和体现，它的发生与同一时期的外国（主要是苏联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化思潮形成了呼应，它的发难须依托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以及中国自身“文学思想有欧化之必要”^①的时代背景，它的发展是马列主义影响中国知识界的一种结果，而它的主要目标是“寻求统一的文学指导思想”^②。中国左翼文学是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在发难之初就通过彰显自身力图解决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问题的方式，实现了与外国无产阶级文学的精神对接，这意味着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学习、依附、借鉴或被动接受外来影响的文艺形态。

左翼文学的发难成功还受助于“五四”以来文艺效用的强化和工具理性的泛化。总体来看，进步知识分子多将文学视为改

① 林语堂：《给玄同的信》，《语丝》，1925年4月20日，第二三期。

② 杨占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序》，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造社会人生的重要工具。比如，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是为了提倡文艺运动以改造愚弱的国民的精神^①，尽管他曾在1927年产生过文学无用的感慨^②，但他依然努力通过文学进行社会批判，或曰要和黑暗社会“捣乱”，这证明他并未丧失用文学改造社会的信念。鲁迅之外，创造社是最典型的例证。早在1922年郭沫若就认为艺术于无用之中有大用：“她是唤醒人性的警钟，她是招返迷羊的圣箴，她是澄清河浊的阿胶，她是鼓舞生命的醍醐，她是……，她是……她的大用，说不尽，说不尽。”^③1925年他更是在上海大学讲演时以古今中外的事例证明艺术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认为艺术的“衰亡”、“堕落”是造成当时中国乱局的“最大的原因之一”，强调艺术具有统一群众感情并使之趋向于同一目标的能力，为此他激励文学青年道：“我觉得要挽救我们中国，艺术的运动是决不可少的事情。”^④成仿吾在1923年声称新文学至少负有对于时代、国语和文学本身的三种使命，他的结论是：“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应当是良心的战士。在我们这种良心病了的社会，文学家尤其是任重而道远。”^⑤1928年他又指出：“今后，我们应该由不断的批判的努力，有意识地促进文艺的进展，在文艺本身上，由自然生长的成为目的意识的，在社会变革的战术上由文艺的武器成为武器的文艺。”并进一步强调说：“文艺决不能与社会的关系分离，也决不应止于是社会

①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

②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

③ 郭沫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载饶鸿兢等编《创造社资料》（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④ 郭沫若：《文艺之社会的使命》，载饶鸿兢等编《创造社资料》（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105页。

⑤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创造周报》1923年5月20日第2号。

生活的反映，它应该积极地成为变革社会的手段。”^①也是在1928年，后期创造社成员纷纷表达了对文学工具论的支持。冯乃超在解析怎样建设革命文学这一问题时说：“艺术是人类意识的发达，社会构成的变革的手段。”^②李初梨在建构“文学宣传论”时说：“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时故意地是宣传。”^③王独清在为《创造月刊》撰写“新的开场”时说：“‘那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这句话我们便用来作了我们今后艺术底制作的唯一信条！”^④与创造社类似，其他进步的文艺团体和成员同样坚持文学的工具论，甚至连国民党御用文人也认为文艺宣传的功效“往往高出于一切的宣传品”^⑤。上述高扬文学功效的言论以其激赏的语气和真切的表白凸显了当年知识界对于新文学的厚望。左翼文人在批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改造社会成效不佳时，也依据他们对马列主义尤其是对历史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学说的简单理解与粗浅认识，大力肯定了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社会价值。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表明，这是新文学中一种重要的新的文学形态，人们将依据它的存在重新界定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文艺与爱情的关系、革命与女性的关系、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与创作实践的关系、作家与工农大众的关系。

① 成仿吾：《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考察》，《创造月刊》1928年3月1日第1卷第10期。

② 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文化批判》1928年1月15日创刊号。

③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1928年2月15日第2号。

④ 独清：《新的开场（卷头语）》，《创造月刊》1928年8月10日第2卷第1期。

⑤ 真珍：《大共鸣的发端》，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30年5月14日第3张第3版。

系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

1927年4月8日鲁迅在国共合作的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做了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讲演，探讨了大革命对于文学的影响，也预测了大革命之后文学的发展走向。这是中国革命文艺理论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它准确地表述了革命文学的发展趋势：从大革命前的“鸣不平”和“怒吼”的文学到大革命时期的“沉寂”的文学，再到大革命成功之后“讴歌革命”的文学和挽吊旧社会灭亡的文学。它告诉读者：革命者做出的东西才是革命文学；大革命可以改变文学的色彩；当时中国还没有对旧制度挽歌和对新制度讴歌的文学，因为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平民文学”；学文学对于战争除了可以作一些战歌之外并无多大益处；文学于革命有“伟力”的说法值得怀疑，但文学确实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①此后，也就是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鲁迅写道：“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②在这里，鲁迅界定了“革命文学”创作主体的身份，指出了何为真正的“革命文学”——富含革命者“愤怒之音”和反抗精神的“怒吼的文学”，界定了“革命文学”的发难起因，暗示了“革命文学”在内容、形式、语句和审美趣味上进行变革的必要性，也表达了他对文学“化大众”（启蒙群众）效用的期望。鲁迅对一切高调的文学主张都持怀疑态度，但他对真正的“革命文学”从未持反对意见。这意味着“革命文学”呈现出来的富含马列主义革命现代性的因素已经被进步文艺界所认可，这些因素推动了中国左

^①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423页。

^② 鲁迅：《革命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4页。

翼文学思潮的发展和嬗变，增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色彩，乃至改变了新文学的性质。马克思曾经指出意识形态革命的巨大威力所在：“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①由此推理可知，正是起源于1927—1928年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及其运用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学说消解了当时中国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终致国民党政权和意识形态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1927—1928年间的大量文学现象证明，中国新文学在思想观念、审美取向、价值观念、叙述方式、艺术体验、精神意向和思维方式上发生了质的变化。

1927年1月，蒋光慈的诗集《哀中国》（汉口长江书店）出版，这是诗人从苏联归来后目睹中国黑暗现状后的悲怆呼喊。其中《我是一个无产者》一诗，高亢地呼叫“我是一个无产者”，愤怒地诅咒有产者的野蛮和恶劣，誓言联合“全世界命运悲哀的人们”夺回“我们所应有的一切”。《哀中国》一诗批判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猖狂气焰，痛斥了国人自甘屈服的为奴心态。《在黑夜里》一诗悲愤地悼念了因追求自由、人权、正义和反抗专制而被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反动军阀联合杀害的上海总工会代委员长刘华，诗人诚挚地称颂他是“不幸者的代表”、“上帝的叛徒”和“黑暗的劲敌”，并坚信他的名字在人类解放的纪念碑上“将永远地，光荣地，放射异彩而不朽”。2月，丁丁编的《革命文学论》（泰东图书局）出版，收录了郭沫若、郁达夫、沈泽民、蒋光慈、瞿秋白、陈独秀、沈雁冰、成仿吾等人论及“革命文学”问题的16篇论文。3月，《文学周报》第267期上刊发了王任叔致郑振铎的信，直言批评《文学周报》第257期刊发的胡适给徐志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

一信中力主和平改造社会的观点，并明确告知世人：“被统治阶级推倒了统治阶级的固有势力时，为自己一阶级的利益，为防止统治阶级的反动”，“而有专政的必要”；“中国现在有二大急需，一种是政治革命现在已经有相当的成绩。一种是思想革命。”^① 4月，茅盾按中共组织指示赴武汉主编《民国日报》。5月，《向导》第194期刊发了《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和《蒋介石屠杀上海工人纪实》两文。6月，郁达夫在东京《文艺新闻》第4卷第6期上发表《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一文，揭露了蒋介石勾结英、日帝国主义和旧军阀旧官僚势力大肆屠杀中国工农群众和共产党员的罪行。7月，茅盾、蒋光慈、潘汉年、钱杏邨、孟超、杨邨人、宋云彬等一批文化人离开危机重重的武汉奔赴上海；同月，上海学生联合会举办夏令讲学会，拟定的讲师和讲题有：沈雁冰讲《新文学》；蒋光慈讲《革命文学》；田汉讲《戏曲与人生》等。9月，茅盾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幻灭》。10月，鲁迅偕许广平从广州经香港来到上海，郭沫若、朱镜我、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李铁声等后期创造社骨干成员也纷纷来到上海。11月，蒋光慈的小说《短裤党》（泰东图书局）得以出版，再现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由失败到最后胜利的过程，提前^②揭露了蒋介石反共反工农的真面目，作者在小说中借工人李金贵之口告诉读者：“你看，从前以拥护工农政策自豪的江洁史，现在居然变了卦，现在居然要反共？哎！这些东西总都是靠不住的！我们自己不拿住政权，任谁个都靠不住。”^③ 其中的江洁史就是蒋

① 王任叔：《通讯》，《文学周报》（第四卷），开明书店1928年版，第529、531页。

② 蒋光慈根据瞿秋白提供的材料和自己的所见所闻于1927年4月3日写完这部小说，当时距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还有9天。

③ 蒋光慈：《短裤党》，载《蒋光慈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48页。

介石的谐音。同月，“第一次世界革命作家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包括中国作家在内的十一个国家的三十多名代表，会议宣布成立了世界革命作家的国际组织——“革命文学国际局（IBRL）”，制定了它的政治纲领，并创办了机关刊物《外国文学通报》，它和苏联的“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以及1928年成立的日本“纳普”（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对太阳社、后期创造社、我们社等革命团体的联合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12月，蒋光慈、阿英、孟超等人创办的春野书店开业，而陈独秀编辑出版了《革命文学史》一书。

1928年初冯乃超、朱镜我等创造社成员提出了“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口号。1月，从日本回国的新加入创造社的冯乃超等人反对与鲁迅联合恢复《创造周报》，他们依托《创造月刊》和《文化批判》等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高举理论斗争旗帜，引进福本主义的“分离结合”理论，与既成文坛的鲁迅、茅盾等“老”作家决裂，挑起了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2月，成仿吾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系统论析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历史必然性和“革命文学”的发展趋势，并对革命文艺工作者严肃提出了必须“大众化”的具体要求^①。蒋光慈发表《关于革命文学》一文，强调“革命文学”的提出是“为着要执行文学对于时代的任务，为着要转变文学的方向”^②。李初梨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他还强调文学家应该同时是一个革命家，其

①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928年2月1日第1卷第9期。

② 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太阳月刊》1928年2月1日二月号。

“艺术的武器”就是无产阶级的“武器的艺术”，“我们的作家”是“为革命而文学”而不是“为文学而革命”的作家，“我们的作品”是“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① 3月，钱杏邨发表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3月号）一文，严厉批评了鲁迅的创作；鲁迅则在《语丝》周刊（第4卷第11期）上发表《“醉眼”中的朦胧》一文，对创造社、太阳社的观点进行批驳。鲁迅的回应引起了创造社、太阳社等的激烈“围攻”，“革命文学”论争持续发酵和步入白热化阶段。4月，潘汉年编辑的《战线》文艺周刊创刊，洪灵菲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流亡》（现代书局）出版。6月，何大白（郑伯奇）发表了《革命文学的战野》一文并声言：“我们主张的革命文学是普罗勒特利亚的文学。普罗勒特利亚是用争斗来遂行它的历史上的任务的阶段。它要用它所创造的一切来代替既往的一切。所以我们的革命文学当然也是要用争斗的方式取一切既成的文学而代之的。那么既成文学的领域就是革命文学的战野。”^② 7月，中共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决议，提出当时宣传工作的基本任务是：“（1）增高一切党员的政治知识。（2）特别应该增高党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工作和宣传员的理论上的认识。”至于党的宣传工作方式，除利用各社会团体的图书馆、党所开办的书店外，可由党员参加各种科学、文学及新剧团体；还必须组织每日出版的工农报纸向全国发行，但报纸的内容、文字、价格要十分适合广大群众的能力和程度。对不识字的工农，尽可能的组织读报小组^③。9月，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政训部社会科在报

①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1928年2月15日第二号。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7页。

③ 参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206页。

上公布了一批所谓“反动刊物”的名单，计有《创造月刊》《流沙》《抗争》《现代小说》《血潮》《海上》《畸形》《峡潮》《洪荒》《奔流》《澎湃》《思想》《流荧》《戈壁》《前线》等多种，并指出售这些刊物的书局是共产党的大本营，诬蔑诸编辑和作者为“第三国际的走狗”，其中许多刊物很快被查封^①。10月，鲁迅的杂文集《而已集》（北新书局）出版，丁玲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开明书店）出版。12月，潘汉年根据党中央在10月提出的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指示，联合沈端先、沈起予、朱镜我、李铁声、王独清、周谷城等42位文化界著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著作者协会”，并在解析协会成立缘起时说：“我们痛心军阀的内战，我们愤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我们益感觉到自己责任之重大。我们是以出卖劳力为生活的，为维持自己的生存，故有改善经济条件与法律地位之要求；然而同时我们是智识的劳动者，中国文化之发扬与建设，其责任实在我们的两肩。我们为完成此重大的使命，敢结合中国著作界同志，成立中国著作者协会，并宣言如右。”^②也是在这一年，《太阳月刊》《文化批判》《我们》（月刊）、《思想》（月刊）、《日出》（旬刊）等左翼文艺刊物得以发行，它们刊载了大量诗歌、小说、戏曲、杂文、论文，并显现出了为左翼文学发难的激进和前卫姿态。

客观地说，“五四”文学革命口号力量衰竭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新文学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观，但是自1927、1928年以后，思想文艺界涌起了左翼文学这股无法遏制的文学思潮。作者们用新的术语、叙述、主张、思想、人物和情节，为

① 杨师群：《党治下的新闻报业——国民党专制时期（1928—1937）新闻报业的考察》，《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② 《中国著作者协会宣言》，《思想》月刊约1928年12月第五期。